

#### 本期专题·行政垄断

- 02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行  
将开启清理地方行政垄断大幕
- 04 发改委：加大反行政垄断的执法力度
- 05 行政垄断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 06 王建勋：行政垄断是应该消灭的

#### 政坛经纬

- 10 郑永年：中国式反腐剑指何处

#### 经济纵横

- 13 陈志武：金融战略与国家的兴衰

#### 人物春秋

- 16 刘伯承元帅临终前将何事重托于华国锋

#### 文化漫步

- 17 中国古代的官方语言是这样说的

#### 历史深处

- 18 郭沫若当年，如何辱骂鲁迅

#### 悦读时光

- 封三 卡尔·马克思的职业撰稿人生涯（一）

**编者按：**在中国《反垄断法》正式出台八年之后，通过近期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确立，反垄断举措有望进入到清理地方行政垄断的新阶段。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制度从7月1日开始已经实施，这是从顶层设计层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

全程参与《意见》起草过程的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接下来，将陆续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培训会等，逐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落实。

“行政垄断”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在标准经济学中，只有两个术语，一个是“政府垄断”，一个是“政府授予垄断”。前者是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比如酒类专卖、烟草专卖），后者是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一个企业。中国所说的“行政垄断”实际上就是包括了经济学的“政府垄断”和“政府授予垄断”。

垄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我们叫自然垄断，另外一种叫行政垄断。真正的垄断只有一种，那就是行政垄断。政府通过权力强行插手经济，阻止官办企业之外的企业进入到这些领域，必然导致垄断。毫无疑问，这种垄断是应该消灭的。

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很多人认为政府应当出手干预，在他们看来这是市场造成的，政府干预会很快校正这种错误，走向正轨，但这不过是一条邪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本来不是市场导致的，政府干预它就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而所谓的自然垄断，某种产品或者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过于集中，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市场导致的。就拿微软来说，很多人认为，微软的操作系统占市场份额太大，或者，我们假定，最后只剩下微软系统，消费者除了购买微软的系统外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消费者受到了强制，所以它是垄断。如果说它是垄断的话，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自然垄断，但这种垄断并不值得担心，也不应当通过强力去消除掉。

在国务院《意见》从7月1日开始实施之际，本刊特此推出“行政垄断”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行 将开启清理地方行政垄断大幕



## ◆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地方行政垄断

经济学家吴敬琏此前在《人民日报》刊文称，国务院《意见》所指出，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垄断、企业垄断、违法给予优惠政策或减损市场主体利益等有违公平竞争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反竞争的传统思维定式在部分官员中也还有很深远的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吴敬琏在文中分析，建立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和纠正妨碍竞争的体制和政策设定，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有效约束政府行为，明确政府权力边界，解决政府干预过多、滥用“政策倾斜”等问题。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目

的正在于此。

关于地方行政垄断，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健中对本报记者说，行政垄断主要包括两种：块状的地区封锁、条状的行业垄断。而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华印象颇深的一个例子来源于二手车市场。

苏华在参与国务院相关指南起草过程中，多次旁听包括零配件、整车企业、经销商、售后服务企业的联合会议。在这个处处都是利益冲突的领域。所有人却对二手车市场的地方垄断行为表现出了惊人一致的无奈和不满。由于地方分割，二手车置换困难，意味着直接打击新车销售。

苏华在给第一财经记者发来的一份地方文件里面明确设定，外地申请转入该省的机动车辆，应该达到国IV阶段排放标准，并经环保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方予受理。

“这是人为地设置了超前环保门槛，限制了商品的自由流通”，苏华说，“而且这已经是各方都已经取得共识以后，还依然存在的问题。”

行业数据显示，2015年，由于二手车限迁、流通不畅导致车辆残值被低估，许多车辆进入置换期的车主决定不换车或延迟换车，最终导致新车少卖约400万辆。

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活跃二手车市场,另外此前《汽车业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含有关于二手车流通的具体内容。据记者了解,在今年6月《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对外发布后,多地政府已经取消限迁措施。

此前,在中国的《反垄断法》中,已经对行政垄断问题有了明确的关注。《反垄断法》第五章就“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开一章,涉及到了破除行政垄断的很多方面。

在《意见》发布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局长张汉东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采取五大举措,其中一项举措就是要加大反行政垄断的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为制度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 ◆将帮助规范产业政策地位

以公平竞争审查为基础,预示着中国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吴敬琏在文章里面表示,在我国发展的早期阶段,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同,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低下和大量社会基础设施需要由国家投资建设,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竞争政策往往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问题的主要方面从解决“有无问题”转向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时,过度的行政干预和“倾斜政策”只会对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转向以竞争政策为主、产业政策服从竞争政策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竞争政策的作用,在于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搭建基础平台,促进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率的持续提高。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就成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

虽然竞争政策成了热词,但产业政策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产

业政策带来的倾向性补贴本身可能会妨碍竞争,对于如何看待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胡祖才也做了回应。

胡祖才指出,产业政策是我们国家发展中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实际上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是为了有效地配置资源。长期以来,产业政策在我国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竞争政策实际是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政策体系的一个总称。随着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竞争政策的逐步实施,反垄断执法力度不断加大,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但是它们之间的着力点和作用的方式确实存在区别,竞争政策主要是着眼于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胡祖才说,产业政策实际是着眼于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来促进产业的发展。虽然两者的着力点和作用方式不同,但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是可以相互协调的。现在国家已经明确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定位,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定位就要协调产业政策,它们之间要进行很好地沟通协调,使二者的政策能够形成合力。

胡祖才强调,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可以确保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能贯穿公平竞争的理念和要求,体现出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推动了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变,这正是产业政策需要努力的方向。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当中的作用,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能够协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目前官方的安排是以自查为主,以增量为主。

《意见》提出,要自我审查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政策制定机关在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时要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自我审查,没有进行公

## 发改委： 加大反行政垄断的执法力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介绍建立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发改委表示，《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已经为建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确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对发改委而言，下一步要尽快推进，确保制度能够尽快落地，下一步要从五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是国家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地落实。

二是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方案，按制度要求展开工作。

三是根据制度实施情况，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指导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四是要加大反行政垄断的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为制度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五是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制度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工作环境。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公平竞争审查的不得出台。

胡祖才说，这主要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也借鉴了国际经验。

他表示，从国际上来看，除了欧盟之外，英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都采取自我评估的方式，必要时征求竞争主管机构的意见。综合考虑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和行政管理体制，为了增强《意见》的可操作性，所以采取了自我审查为主的方式。

此外，7月1日以后，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省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审查以后符合要求的可以出台。若

不符合要求，需要自行纠正。

“自我审查能否完全规范进行，我们有外部监管，”胡祖才说，“因为政策出台以后一公开，市场就要进行评价，如果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的要求，政策制定机关就要进行自我纠正。竞争主管机构也可以提出建议请他纠正，这是新的政策。”

对已经实施的存量政策，这一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提出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坚持分类处理，遵循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区分不同情况，把握节奏，有序进行清理。

(2016年07月08日第一财经宏观 郭丽琴)



## 行政垄断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近日,人民日报记者对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和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的53家企业成本状况展开调查。调查中,不少制造业企业反映,虽然煤、油等原材料价格一直在降,但一些来自水电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

在调查中,企业反映的几个垄断性成本高企的问题,实质上都属于这些垄断性企业持着自身的实际垄断地位,提供低质量服务、征收额外费用而产生非必要不合理成本的结果。

第一类问题,是浙江嘉兴鼎美电器反映的废水处理问题,由于特许经营一地只允许一家废水处理公司,而该企业每年最多只能来回收两次,企业不得不将废水以桶装载堆放于厂区中,占地几百平方米严重影响正常生产。据悉,去正规厂家处理三废还需要“跟政府打招呼”才能“挤”进去。三废处理与环保息息相关,这一领域设置特许经营本为保证服务质量与环保效果,结果由于牌照数量或拥有牌照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供给远小于需求,导致企业的正常三废处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不仅影响企业生产运营,废水堆放还增加了环境污染可能。这些负溢出效应都是本不应存在的,对于特许经营牌照的数量及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服务质量都应有动态监测与严密监管,如果数量不足应予以补充,若在服务容量范围内却不予响应则应有惩罚及回收特许经营权的机制。

在调查中,企业最不满意的一项是“变压器基本电费”制,即企业只要装了变压器,即使不用电,若不报停就要每月缴纳变压器基本电费,河南一家企业每个月光这一项费用即高达数百万元,而且每年只有两次报停限额,近年来实业不景气,不少工厂已停产,

也只能白交这一费用。令企业费解的是,类似于装机费的变压器基本电费何以要每年缴纳,即使有维护成本亦达不到这个数目。上述第二类问题,是非常普遍的企业仗着垄断地位收取额外费用或不合理收费,供电局只有一家,企业无从选择,供电局无需提高服务取悦客户即可坐享高收费,自然没有动力改善或公开账本,这是垄断性行业中十分常见的问题。

最后一类问题,则为资源型改革的根本所在——行政垄断导致的企业不必要成本。无论是铁路运输价高及高速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延迟收费年限导致的物流成本高企,或是输配电垄断导致的电力成本居高不下,本质上都是一样,就是在失去自然垄断性质的领域或环节以行政法规确立实际垄断地位,产生了垄断性价格,抬高了企业成本,影响了经济运转效率。目前,高速路不合法延迟收费依然故我,输配电改革进行至直接监督但仍未实现独立核算,只有很少的企业能享受到直供电的改革红利。

以上三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行政垄断导致垄断性成本。电力、用水和物流成本都是企业成本的大头,特别是近年来环保要求逐渐严格,电力成本上升,部分企业电力成本已占三成,而这些额外的、不应该存在的垄断性成本,拖住了陷在泥潭中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腿。显而易见,垄断性成本对于挣扎求存的企业来讲是雪上加霜,已经成为了经济复苏与转型的绊脚石。

行政垄断不仅影响了行业发展,亦令企业产生了不必要的垄断性成本。破除行政垄断势在必行,只有从根源上打破行政垄断,修订或删除不合理的行政法规,去掉这些直接或间接保护着它们的外壳,才能让一系列为企业减税减负的改革和努力不付诸东流。

(南方都市报)

# 王建勋：行政垄断是应该消灭的

受访者：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采访者：胡子华（腾讯思享会）

本期精彩内容：

1. 人们在市场上会交易毒品，是因为有人想要毒品，这完全是交易者个人的问题，不是市场导致毒品出现，也不是市场导致人们交易毒品。

2. 说市场有缺陷，等于说自然规律有缺陷。市场的波动是正常的，想要避免这种波动，就像我们说应该只有春秋，不要夏冬，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3. 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很多人认为政府应当出手干预，在他们看来这是市场造成的，政府干预会很快校正这种错误，走向正轨，但这不过是一条邪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本来不是市场导致的，政府干预它就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4. 自然垄断不可怕，可怕的是行政垄断，靠强力、靠暴力、靠国家权力支撑的垄断，这些东西是需要打破的，可是我们中国大量的民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 说市场盲目是一种错误

思享会：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里，经常接触到的一种观点是市场具有盲目性，人们在逐利的过程中，很容易致使毒品、色情等商品和服务四处蔓延，给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它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怎么看待这样一种观点？

王建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把市场当成一个人，好像市场有自己特定的目的，有自己的意志，它知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如果市场导致的结果让人们不喜欢，就认为它盲目了，没有脑子。可市场只是提供了一种合作

的机制，并没有自己的意志，市场里面发生的一切都是市场参与者所做出的选择。人们在市场上会交易毒品，是因为有人想要毒品，这完全是交易者个人的问题，不是市场导致毒品出现，也不是市场导致人们交易毒品。



枪支、毒品、性等交易经常被用来说明市场的“盲目性”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毒品都有害，我们用的大量药物中都含有一些毒品，如果没有这些毒品，这些药可能也不存在。究竟毒品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受到管制，这其实是一些政策性的考量。有些人认为那些危害比较大的毒品应该禁止或者限制，另外一些比较轻的毒品，应该完全放开；还有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去限制毒品，一则它不对别人造成伤害，它只对使用或者消费毒品的人带来一些“伤害”，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伤害的话。色情服务也是一个道理，红灯区的存在并不对第三者造成伤害，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禁止呢？如果按照这种不伤害原则来理解或者界定自由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去限制它。事实上，性交易这种行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绝迹过，人们总是试图要消灭它，但从来没有做到

过。因为有这样的需要，就会有这种服务，你不让它合法，它也会地下存在，毒品也是同样的道理。

**思享会：**关于成瘾性的毒品，通常的印象是它很难靠自身力量摆脱，而且在潜意识中它还可能被视为一种“传染病”，会由一个人推销给另一个人，形成扩散链条，所以对它会有本能的恐惧，会将它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由于这种难自控的属性，我们会觉得如果有一个外力来控制，似乎会更安全。

**王建勋：**除了毒品以外，让人上瘾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烟瘾，比如网瘾，前几年天天有人在倡导戒掉网瘾的问题，尤其是对孩子们，提出的建议包括禁止上网或者关掉网吧等。但是，你能废除网络吗？其实不能，我们应当把它分散地交给单个的人或者家庭或者组织去解决，而不是说全社会范围内禁止上网。就跟现在的微信一样，我们每天都要看好多次，这也是上瘾。难道我们要废除微信？如果当局立一部法，规定每个人每天上微信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小时，这不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吗？毒品其实也是一样的，它跟其他的产品和服务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网瘾漫画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偏好，这种偏好很多时候跟自己的偏见，跟自己的误解，跟自己的观念，甚至跟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等都有关系，而人们的观念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比如，在美国一些州，一些毒品已经放开了，而且放开之后，并没有像人们



自然的市场波动就像天气变化一样，是客观规律的一种表现。

想像得那么可怕，好像一旦毒品放开，或者放松管制，大家就都去吸食毒品了，整个社会就完蛋了，其实并不是如此。

#### 说市场有缺陷，等于说自然规律有缺陷

**思享会：**除了盲目性，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市场具有滞后性，这个滞后就会产生一些资源的浪费和损耗。那我想问的是，这是不是市场的缺点？如果是缺点的话，宏观调控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解决？

**王建勋：**说市场有缺陷，等于说自然规律有缺陷。市场上的波动，比如股票市场突然会升，突然会降，如果这种升降不是因为不当或者错误的政府决策造成的，它根本就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就像天气会忽冷忽热一样，我们应该完全尊重这样的市场波动和变化。我们想避免这样的变化，就像我们说应该只有春秋，不要夏冬，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市场不是一个人为的东西，不是一个有意志、会思考的东西，而是一种人类合作方式或者机制，你怎么能说它有或者没有缺陷呢？你要说它有缺陷，你就认为自愿合作有缺陷，可自愿合作有什么缺陷？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表达方式。

**思享会：**市场与自然规律的类比，在读者中导致的一种质疑是，这样的自由市场太完美了。

**王建勋：**用完美或者不完美来衡量和界定市场，同样是一个误解。我所强调的市场，之所以在

很多人看来是完美的,是因为在他脑子里有一堆对市场的误解或者是对市场的负面看法:他认为市场导致了贫富差距,你竟然说没有;他认为市场是盲目的,你竟然说它不盲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我们对市场的负面看法和偏见导致了有关市场完美不完美的错误表述。

市场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规律,它在发挥作用,它在左右人,不管你认为它完美或者不完美,如果你不尊重市场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市场谈不上完美或者不完美,我们只能说市场的参与者是完美或者不完美的,我们只能说这个市场所带来的后果是你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从人性的意义上讲,每个人是有缺陷的,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一定会在市场上做出糟糕的决定,错误的选择,而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当中,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市场导致的问题,其实是市场参与者所带来的问题。



市场参与者都是不完美的  
干预市场带来的结果一定是坏的

**思享会:**为什么在上世纪30年代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会成为当时的经济主流思想,而且我们确实也看到它的经济出现了复苏,并趋向稳定和繁荣?

**王建勋:**干预市场的观念并不是从1930年开始的,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的理论家。这么一种观点,究其实质还是基于对市场的误解,诸如说它具有盲目性、滞后性,会带来包括贫富差距等各种问题,出于这些偏见才认为需要对市



华尔街崩溃之日的景象

场进行干预。如果认识到这些人们不喜欢的后果与市场无关,那么这种干预的理论就站不住脚,所谓的1920年代、30年代经济危机,根本不是市场所导致的结果,那么你去干预它是为什么?相反,这些危机可能恰恰是干预市场所导致的。

对美国的大萧条,只有极少数的理论家预见到了危机会发生,除了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之外,绝大多数理论家和民众都没有认识到。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注意到了在此前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政府一直在不断干预市场,当时他们发现政府的干预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糟糕或者危险的,并准确地预测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政府干预的后果短时间内我们看不见,但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显现,当时身处其中的人不能感受到这点,表面的、暂时的繁荣误导人们在某个领域更多地投资,结果正如所料,出现了泡沫,出现了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很多人认为政府应当出手,应当干预,在他们看来这是市场造成的,政府干预会很快校正这种错误,走向正轨,但这不过是一条邪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本来不是市场导致的,政府干预它就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这个危机本来有可能更早渡过,或者以更小的代价来结束,恰恰是政府的干预、罗斯福的新政,进一步扭曲了整个经济的运作,让危机持续的时间变得更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干预并没有带来更好的



结果，而是更坏的结果。

**思享会：**干预导致市场出问题，那么有没有可能，干预偶尔也能起到好的作用，诸如负负得正之类的，或者还是说，只要是干预就一定是坏的？

**王建勋：**干预一定是坏的，因为就像人生病了一样，你把病因找错了，你让他吃药，这些不能对症的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更大的负作用。干预导致的问题，不能试图通过再干预来校正，这时候你应该减少干预，这是毫无疑问的。

#### 自然垄断不可怕，需要打破的是行政垄断

**思享会：**在涉及国家干预和国家调控的理论中，除了标榜市场是有缺陷的，还会强调放任市场容易导致大财团和大企业的垄断，市场优势一方会通过一种不正当竞争打压对手。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王建勋：**无论是对垄断，还是对不正当竞争，我们现在都有太多的曲解。

先说垄断的问题，垄断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我们叫自然垄断，另外一种叫行政垄断。在我看来，真正的垄断只有一种，那就是行政垄断。政府通过权力强行插手经济，阻止官办企业之外的企业进入到这些领域，必然导致垄断。毫无疑问，这种垄断是应该消灭的。



而所谓的自然垄断，某种产品或者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过于集中，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市场导致的。就拿微软来说，很多人认为，微软的操作系统占市场份额太大，或者，我们假定，最后只剩下微软系统，消费者除了购买微软的系统外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消费者受到了强制，所以它是垄断。如果说它

是垄断的话，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自然垄断，但这种垄断并不值得担心，也不应当通过强力去消除掉。我们现在对于不正当竞争的定义有很多错误，似乎如果某个产品或者服务占了市场的大部分，就会带来不正当竞争，就应该限制它，或者拆分它。可微软又没有强迫你使用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它完全是建立在自愿购买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有一天微软真的实现了全球垄断，把其他的生产商都挤下去了，那一定意味着它是以市场上最好的产品或者服务、最低廉的价格赢得了消费者，这是个自然的竞争过程。担心这样的自然垄断，或者把这样一种自然垄断理解成市场带来的糟糕的后果，都是错误的。在市场开放的前提下，这种自然垄断一点都不可怕，人们的需求太多样化了，它往往很难维持长久，因为一些企业家看到这个领域有利可图，就一定会前仆后继地参与进来，成为微软新的竞争对手。

举一个实例，前几年中国几家大的牛奶生产商定了一个价格联盟，统一说好多少不降价。很多人认为垄断了，不正当竞争了，但你会发现他们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市场上还有很多小的牛奶生产商，他们不降价，我们就喝小生产商的牛奶，或者喝替代品，这些企业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包括方便面的企业，也搞过好几次所谓的价格联盟，也有人称之为垄断协议，但你会发现它根本维持不了多久，这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行政垄断，靠强力、靠暴力、靠国家权力支撑的垄断，这些东西是需要打破的，可是我们中国大量的民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往往认为电力、石油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应该掌握在政府手里，这是极其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如果这些行业由私人来经营，参与自由竞争，它的价格会比现在低得多，服务也会比现在好得多。我们现在用手机的话费几乎是全世界最贵的，我们的汽油价格比发达国家还要贵，这没有道理。国家行政垄断很容易形成垄断价格，这对社会、对消费者都没有任何好处，这种垄断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打破。

（腾讯 思享会 王建勋 2016-06-22）



## 郑永年： 中国式反腐剑指何处

**编者按：**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令计划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令计划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这就是说，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我在《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一书中就从这三步来讨论清廉政府建设。

### 一、经济改革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都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那么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使私有财产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那么命运就会非常悲惨。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们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权力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实际上,即使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我们

继续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那么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流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后发展中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然而,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

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的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把财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这里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财富的加速度流出。

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根据西方的经验,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通过税收等机制鼓励这个群体投身到办学、社会慈善事业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一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中国不妨从这些先发展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不不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高过前者。

## 二、 社会改革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清廉政府的建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到社会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而且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那么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那么社会压力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我们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

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而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

### 三、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清廉政府的建设更需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前面所讨论过的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例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

## 陈志武：金融战略与国家的兴衰



陈志武

**【摘要】** 政府不应该站边，不能把资本市场的发展当成政策工具。

6月28日，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做客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金融战略与国家的兴衰》。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文字未经演讲者审订）：

**正文：**

大家好，刚才两位教授讲的那么好，他们两位是真正的北大人，其实我跟北大沾一点点边，没那么强的关系，所以，我要向他们多学习。

刚才王教授讲到的话题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心情

比较沉重，原因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讲的话题还是国际政治，还有张维迎教授讲到的长时段人类历史的演变，离那些话题稍微远一点，谈一个更实际的话题。

中国对于把自己的国家做大做强非常关注，所以，从经济史的研究来看，你要把一个国家长久地做强，那就离不开创新，技术方面的创新非常重要，同时组织方面的创新、文化方面的创新也都非常非常地重要。

一谈到创新，我们在今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太容易逃避的一个结论，就是美

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一个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都自己培养，成

本非常高。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国很显然是世界创新大本营，引领世界很多方面的创新，特别是高科技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直关心的话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创新能力那么强？是不是每一个美国人从一出生，他们 DNA 的组成就不一样？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人都是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移民，来自欧洲的移民，来自中国的移民，来自印度的移民，所以，从基因上来说肯定没什么差别。到底是什么使得美国的创新能力、创新文化那么强？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告诉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是好东西。

道理蛮简单，比如在中国，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腾讯这样的公司。腾讯这个公司创办于 1998 年，到今天也不过 18 年，尽管才创办 18 年，但它的创始人马化腾的个人财富有一千多亿，将近两千亿，这将近两千亿的钱，相当多的是来自对未来无限多年创造收益能力的贴现、求和得到的一个估值。换句话说，马化腾一千多亿两千亿的个人财富与其说是今天已经实现的收入，还不如说是对未来收入的一个贴现，一个定价，一个提前可以变现的安排。

我之所以讲到这个，类似于马化腾、腾讯这样的故事在美国过去 200 年左右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上已经出现了非常多个。我之所以想讲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一百多年以前，美国出现了爱迪生，今天我们熟悉的 GE 公司，是由爱迪生 1886 年创办的。爱迪生之后又有 20 世纪的盖茨，还有现在的 Google，就是因为资本市场跟美国很早提供了对未来做定价、做变现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一来就让美国很多的年轻人、让中国今天的年轻人看到，只要你创业理念很好，创造出来的产品——不管是 QQ 空间还是微信——可以改变这么多人的生活，给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收益，人们就愿意对你腾讯的未来做非常高的定价，这样一来马化腾不用等上一百年两百年，今天就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他创办的公司能够带来多高的价值，以这种方式直接激

发更多的千千万万个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大家都可以学着像马化腾这样去创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是一个好东西，尤其是从中国来讲，大家想一想，今天哪个行业创业创新的活力是最强的？肯定是能够到资本市场上市的这些行业，创新创业的活力是最强的。美国式的创新文化并不是因为他们的 DNA 跟别人不同，而是因为激励架构，资本市场提供的方方面面的定价和变现的途径跟传统社会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变化造成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盖茨，还是 Google，很多的创始人，他们都是美国普通老百姓家庭出身。

所以，正因为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现代资本市场跟传统的银行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屌丝、对富二代带来的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是原来传统的银行所没办法比的。道理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你要到银行借到钱，要向银行融资的话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抵押品，在手头要有很多的资产，这就说明为什么银行对于富二代、对已经成功的企业是非常有利的，但对还没有什么资产、没有什么财富的屌丝、富二代非常不利。不过相比之下，PE/VC 这些现代资本市场的企业、融资手段，他们看重的是未来收益，看淡你手中的那些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 PE/VC 学得越来越好了以后终于让很多的屌丝、很多的富二代受益。只要有很好的创新创业的能力，也可以成为下一个马化腾。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对国家的富强、对创新文化的推动，对创新创业的激情的激发是非常非常根本性的。所以，是好东西。

第二个我想要讲的，既然资本市场是好东西，政府在中间应该起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跟张维迎教授都很喜欢谈的一个话题。我首先要强调，政府千万不要把资本市场当成政策工具，中国从 1990 年推出股票市场到现在，每次一想到要发展资本市场，要么就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要么就是为了推动政府的创新创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千万不要这样

做，如果要发展好资本市场，要发展好金融市场，政府应该做的就是不要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买方和卖方，为任何一方站台。

1990年的时候政府显然是帮助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站台站边。去年6月份股灾之前政府也是帮助资本市场的卖方（股权的发行方）站台站边，结果使得这些资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被抬得过高，把泡沫吹得太大。每次政府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为一方，尤其为卖方站台，就必然意味着要牺牲掉买方的利益，因为你把这些本来不值钱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股票炒得那么高，让那些股民付了很高的价格，你说这对股民、对买方是有利的吗？肯定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一些基本的观念，尤其是很多专家不要动不动一看到股市是好东西、资本市场是好东西后，就要去说服政府，因为为了经济发展，为了这个宏观经济政策，为了那个政策，要一边倒地扶植这些发行证券的企业，为他们站台，然后以这种方式制造一个短暂的泡沫、短暂的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样做的话，最后看到的结果就像互联网金融行业一样，把金融市场、把资本市场长久的发展前景断送掉了。尤其是一说到互联网金融，大家都知道去年之前，整个社会、各级政府没有哪一个敢对互联网金融唱反调或者说看衰的，因为大家知道那是政府一边倒地推动互联网金融的时候。

我想强调一下最近一两年一个不好的趋势应该停掉，很多地方看到PE/VC行业产业基金对经济的发展、对创新创业的好处以后，各个不同的地方政府都在推出他们自己的PE/VC基金、产业基金。千万不要这样做，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说我们要推出自己的产业基金、PE/VC基金，而且不强调投资回报。为了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我们不求投资回报，但是我们去做自己的PE基金、VC基金。大家都知道PE基金、VC基金，还有其他创业投资的基金行业之所以在美国、对美国的创新创业起了那么关键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只追求投资回报。

如果有地方政府通过自己办各种基金进入PE/VC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以后，把本来应该是最市场化的、最追求市场喜欢的投资回报的这样一个行业也给它搞乱了，让那个行业走向越来越非市场化，越来越不看重投资回报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过不了多久，这个行业整个会搞乱了，把本来那么市场化的一个好东西也最终变成是四不像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介入PE/VC以后，对真正市场化的PE/VC基金的“挤出效应”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是非常大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最近大家讨论得也比较多的，关于金融改革到底改什么，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好几年，到最后集中到把“一行三会”合并为一个大部委，我是希望呼吁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好不容易有“一行三会”，过去这些年监管竞争才为私募基金行业，为中国的企业，为理财产品市场、信托市场提供了一些发展的空间，如果以后真的是把“一行三会”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的话，那最后的监管竞争就不再有了。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万一单一的大部委不作为，中国金融市场怎么办？中国经济怎么办？中国社会怎么办？那就可能没有哪个路可以走通了。

至少现在在“一行三会”，如果四个机构中有三个不作为，只要有一个愿意有作为还可以有一点发展空间，如果把它们合并为一个机构的话，那整个彻底完蛋了。

所以，我希望参与改革讨论的不同的专家学者和决策层应该千万记住：监管竞争也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

总结一下我这里强调的三点是：第一政府不应该站边，不能把资本市场的发展当成政策工具。第二，地方政府不应该自己去做PE/VC，政府只要在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基本的资本市场方面做得很好，那就够了。第三，“一行三会”一定不要合并为一个大部委。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腾讯 思享会 陈志武 2016-07-01）



## 刘伯承元帅临终前将何事重托于华国锋

**核心提示：**一位日本学者撰文写道：“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老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10多年间，刘伯承和邓小平曾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历史以自己特有的行程，把刘邓连在一起，他们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刘邓连结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仅从刘邓生活方面的交往并从中可见一斑。

让我们先从邓小平为刘伯承祝寿说起吧。

邓小平和刘伯承同是四川人。刘伯承出生于1892年12月4日，比邓小平年长12岁，生肖都属龙。1942年刘伯承即将迎来自己的50寿辰。

1942年，可以说是敌后各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一年。为了鼓舞全体军民的抗日斗志，为表彰刘伯承领导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功绩，为提高并活跃部队的情绪，掀起一个向刘伯承学习的高潮，邓小平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为刘伯承祝寿的活动。

对于组织上的关怀和邓政委的深情厚谊，刘伯承深感欣慰。但他却坚决不同意举行祝寿活动，不

愿宣扬自己。为此，他连自己的生日都秘不宣告。

无可奈何的办事人员实在没招了，只好去搬邓政委来劝。邓小平听了工作人员一番叙述，笑了笑说：“我有办法让师长开口讲。”因为他最知道、也最了解这位老大哥一样的师长的性格脾气。因此，进门就说：“师长，我看你还是讲一下子！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了的。没得年谱和简历咋个庆寿嘛！这些人既然来叨，你就简要地谈谈嘛，更详细地以后可以再谈，你说好不好？”

刘伯承沉默了片刻，说道：“既然政治委员说了，这是党的决定，那我只好无条件地服从了。不过说实在的，我的生日已经过去10几天了呀！”

一看刘伯承松了口，机智的邓小平马上接上说：“具体日子在哪天不要紧，拣日不如撞日，依我看就定在12月16日好了。”

刘伯承这回算彻底没话讲了，因为他历来是尊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决议的模范。

1942年12月16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和煦。太行山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军民一起，纵情高歌，到处是欢声笑语，衷心祝贺统帅兼士兵的刘伯承将军健康、长寿。129师师部宾客如云，函电如雪。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滕代远参谋长，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各个区党委的同志，都来到了师部，参加庆寿。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以及129师《战场报》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消息的年谱和简历。

邓小平作为与刘伯承亲密无间共事的老战友，又是这次为刘伯承祝寿活动的发起人和主持人，自然是有更多话语要讲。为此，（下转第20页）



## 中国古代的官方语言是这样说的



中国幅圆辽阔,但语言较为统一,这与中国的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也是中华大地牢不可分的民族团结的结晶,只是有了汉语语言载体,才有了我们中华民族!

在我国汉族人聚集的地方语言主要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及部分沿江地区,俗称北方话,一些教科书上统称“官语区”,语音中的大部份类似于北京音,所以所谓的“官话”现在称为普通话的语音,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结合这一地区音调的特点,把音调分为四声。在这一语区内的,不论相隔千万里,语音虽有一定差别但基本上都能听的懂,这也是普通话的基础,否则不能称其为普通话了,不能用做官方语言了。我们现在的普通话的官方定义就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其实官语区成型的年代历史久远了,已经无法(或者说很难)考证这一地区的语言、语音怎么样形成、扩散和流通的。有人考证说魏晋后我国中原一带的语言音韵就相对统一了,三国时的魏国就有人著有《声类》十卷,系统地对当时所用的语音做了分类,可见当时我国的语言、语音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语言体系,该书被认为是最早的韵书。到了南北朝时,有了《四声补韵》,以四声作为汉语的声调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并已经形成了体系。可见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区域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广大的同一民族同一语音的地区,是形成我们全国还在还在普遍使用的官话(普通话)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官方语言就是和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是相差无几,从历代的文献看来,唐宋以前,包括唐宋年间口语中文言成份占多数,元明时期,中国北方民间的口语已经很接近我们现在的北方口语了,这可以从元代的歌词戏曲和小令,明代的评话小

说中看出来,其实明代的官方用语都很接近白话,文绉绉的文言相对以往各朝代都要少的多。可是到了清代,清王朝虽说是满人入关,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但却非常崇拜汉文化,满文也是当时的官方语言,但使用的还是以汉语为主要官方语言,到是清中期,汉语言却有了复古的回潮,一时间,讲究对仗压韵,工整文字游戏的骈骊文都大行其道,当时的满清帝对汉族文化,古汉语情有独钟,满朝文武趋之,民间效仿。这一时期的文字文学,有典型的复古现象,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就是《聊斋志异》了。我们现在官方用语的文字语言和口语语言差别已经很少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不能说没有一点差别)。官员们在台上长篇大论的做报告,很多对着稿子读,就是口语,小说也可朗诵,听起来也没什么差别。

古代诗词是研究古汉语的最好的对象,有人说某种语言读诗词最押韵等等,都是相对某一首诗词而言,大多数的诗词还是以现在的普通话读起来更押韵些,古代文人做诗词歌赋时应该都要以当时流通的语音为标准,但都带有诗人家乡地方的语音痕迹,所以在诗词音韵格律没有统一之前,古代的诗词今天我们读起来有些地方很拗口就不足奇了。古代的诗文献《诗经》,现代人用普通话读起来,也能朗朗上口,韵脚拗口的还是不多的,说明古代长江以北的这一地区的语音就有很大的相同点了。有网友说闽南话、粤语最接近古汉语了,这点倒不敢苟同,只能说这两种语言中保存的古汉语的语音和语法相对多些吧,用这两种话朗读古诗词,我没听说过,但从我所听过的对我来说完全听不懂的这两种话读古诗词,反而就能听懂了?“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

## 郭沫若当年，如何辱骂鲁迅



今年是鲁迅去世 80 周年。《短史记》栏目将陆续推出专题，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本期聚焦：鲁迅和青年们的关系。

**郁达夫：鲁迅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在与攻击他的青年搏斗**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去世。1938 年，好友郁达夫在香港《星岛周刊》刊文回忆鲁迅，其中写道：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邨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

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sup>①</sup>

鲁迅乐于提携青年，是出了名的。那么，为何又会有这么多青年攻击鲁迅，以至于其“全集的十分之六七”，都是与青年们“搏斗”的产物？

**左联成立前，青年们围攻鲁迅三年之久，郭沫若骂得最狠，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

郁达夫当然没有诬蔑青年的意思。事实上，从 1927 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确曾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已堕落到“趣味文学”的绝路上；冯乃超嘲笑他“醉眼陶然”，成了社会变革的落伍者；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会“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淆青年的

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是首流传最广最有名的古诗了，用广东话朗诵反例比现在的普通话朗读还要押韵？还要有韵味？

长江以南语音的差别就相当大了，最复杂的主要是浙江，安徽与浙江交界的古徽州（清代以前的古徽州隶属江南，属钱塘江水系）在这些山区小县中语音相对复杂，而且不象北方地区虽然有方言，但基本音类似，相互间能听懂言语，可在上述地区基本音都有很大差别，本县中人如是南北乡，如不接触一定时间，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语言，相邻两县之间语音相差就更大了，这可能是山区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交流不多的原因。所以古代汉语的语法，语音，在这一地区保留最多，在这一地区的语言中，音调远多于四声调，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最好的实际教材。有些

教科书把徽州的地方话单列为一个方言的语种，古代汉语在南方各省的方言中普遍存在，越偏僻的小县城，尤其是山区，沿海的一些小县，口语中的古汉语保留的很多，对话中还有文言文的痕迹。有些人把某些单字的发音来说明保留的古汉语的多少，如总把广东人对 8 的发音，为“发”，是古汉语，其实这种保留古汉字发音的地区太多了，中原一些地方，把 6 读成“录”如安徽的六安，正确读音就是“录”安，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现在人们认为的闽南话、粤语是在那一地区的当地人能听的懂，能接受的语言，是那一地区的官话，在那一地区还有他们自己的方言，这种方言基本音还是相同的。

(<http://blog.sina.com.cn/hyte193840>)

耳目”，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这当中，要数郭沫若(小鲁迅十岁)骂得最狠。1928年夏，郭化名“杜荃”，刊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对鲁迅大扣帽子，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蒂)”。<sup>②</sup>

这种攻击，直到1929年底才告终止。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指示吴黎平、潘汉年等人“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sup>③</sup>潘汉年因曾参与攻击鲁迅，被鲁迅反讽为“年轻貌美、齿白唇红，……是天生的文豪”，故找了未参与围攻鲁迅的冯雪峰，要他去向鲁迅疏通，请鲁迅出来做新成立的“左联”的盟主。



郭沫若化名骂鲁迅的文章，刊于创造社官方刊物《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左联前期，鲁迅作为盟主备受尊崇，但盟内青年们并不认同和服从他的意见**

做了左联的盟主，并不意味着鲁迅在思想上获得了盟内青年们的认同。夏衍在晚年坦承：“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别的。”<sup>④</sup>所以呢，左联的行动，事实上并不以盟主鲁迅的意见为准。

1930年4月底，左联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要求所有盟员都要动起来，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劳动节变成一个“血光的五一”。盟主鲁迅没有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鲁迅是反对这种街头政治运动的，在他看来，上街刷标语发传单搞集会，不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他曾援引过列宁的话为虎皮，主张真正的革命者应优

先致力于风俗、习惯上的改革。<sup>⑤</sup>

但他的话没有人听。矛盾回忆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

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受着尊崇的主帅，只好对矛盾自嘲：“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其实，“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权。1930年秋，因为“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盟员蒋光慈愤然退出组织；同年冬，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也因为强调“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被开除出了左联。<sup>⑥</sup>

**左联后期，青年们的攻击，让鲁迅“寒心而且灰心”，生出了幻灭之感**

1931年底，左联上街之风回落，转而致力于文化领域的批判。首当其冲被批的，是学者胡秋原提出来的“自由人”观点。胡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存在。

鲁迅没有直接参与对“自由人”的批判(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的“自由人”文艺观，文章《论“第三种人”》曾隐晦而尖锐地嘲讽了胡秋原)。只是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诗歌《汉奸的供状》，恐吓胡秋原“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后，鲁迅公开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想要挽救该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冯雪峰当时正与胡秋原接触，欲通过胡来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鲁迅的文章，安抚了胡秋原，却激化了左翼文学青年们对鲁迅的不满。祝秀侠化名“首甲”、钱杏邨化名



“方萌”、田汉化名“郭冰若”，刊文批判鲁迅反对辱骂和恐吓，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在“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号召革命的诗人不要怕“见面”，只要骂的对象没错，“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负责编辑刊发那首恐吓诗的周扬，此后与鲁迅关系之恶劣，更是众所周知。<sup>⑦</sup>

1934年春，左翼青年们的攻击，已让鲁迅生出了幻灭之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sup>⑧</sup>1935年春，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sup>⑨</sup>1936年春，冯雪峰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鲁迅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而据胡风披露，冯雪峰曾私下对他如此评价鲁迅：“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他只是签一个名。”<sup>⑩</sup>

当然，即便如此，鲁迅仍坚持留在了左翼文学阵营之内。1936年托人送给毛泽东的火腿，即是明证。

注释

① 郁达夫，《忆鲁迅》。②《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



左，1988年，邓颖超会见胡秋原；右，胡秋原1938年出版的著作。鲁迅虽然反对恐吓胡秋原，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提出的“自由人”文艺观，在文章《论“第三种人”》中，鲁迅曾尖锐嘲讽胡秋原的这种理念

文学倡导中对鲁迅的围攻》、《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P168-185。③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我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点滴忆》，收录于《左联回忆录》。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⑤鲁迅，《习惯与改革》⑥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⑦首甲等，《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收录于《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1卷》。⑧鲁迅，《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⑨鲁迅，《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鲁迅，《致萧军》，1935年4月28日。⑩胡风，《鲁迅先生》，收录于《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腾讯 短史记 2016-07-04 第515期）

（上接第16页）他撰写了热情歌颂刘伯承高尚品德及其为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长篇贺文——《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在文中，邓小平热情洋溢地写道：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余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

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5年来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去做……（快报）